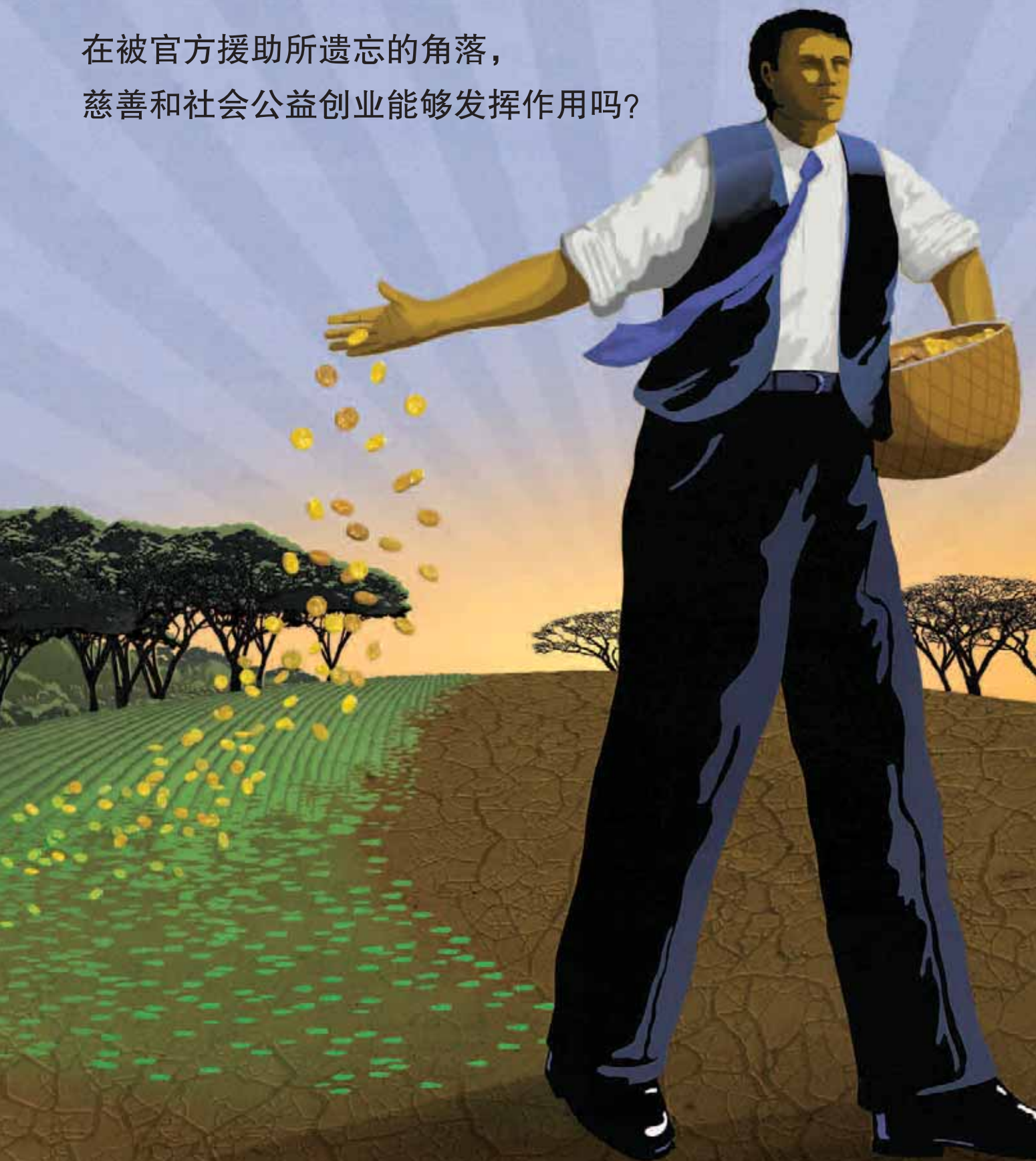


在被官方援助所遗忘的角落，
慈善和社会公益创业能够发挥作用吗？



慈善义举

马莉娜·普里莫拉茨

慈善事业和社会公益创业由来已久。安德鲁·卡内基、约翰·D.洛克菲勒以及范德比尔特家族曾帮助美国建立了其文化基础设施。玛丽亚·蒙台梭利、约翰·缪尔和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被公认为教育、自然保护和公共卫生领域早期的社会公益创业者。

现在，慈善事业正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很多国家的政府考虑退出慈善行动的同时，富人们在捐赠方面更有创造性和战略性，并且——如果比尔·盖茨用他的方式的话——更加慷慨大方和积极主动。

2010年6月，沃伦·巴菲特以及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发起了一项名为“捐赠承诺”（The Giving Pledge）的行动：全世界部分亿万富翁公开承诺将自己的过半财富捐献出来，以鼓励更多的人进行捐赠。迄今为止，已有81位亿万富翁签署了“捐赠承诺”，其中仅巴菲特一人就承诺捐献370亿美元。

现在，慈善家们鼓励其他同等地位的人开展同样乃至更多的捐赠。捐献财产和解决社会问题，也不仅仅是转交巨额遗产或者死后捐款那么简单。

包括斯坦福大学、乔治敦大学、杜克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在内的美国大学已设立了有关慈善的课程，甚至建立了慈善研究中心。其中一个方法是研究如何加大慈善力度，为项目获得更多的资金。另外一个方法是研究如何衡量慈善的效果（即影响），以便从捐献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不过，目前的研究工作仍存在不足：除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私人捐赠的数据仍然有限，但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私人捐赠正变得愈发重要。例如，香港实业家和亿万富翁李嘉诚捐赠的金额已超过15亿美元，并已承诺将他财富的1/3——估计约90亿美元——捐献给慈善事业。

一个人捐献多少钱是一回事，它可产生多大的影响则是另一回事。因此，慈善家和学术界都很关注捐赠可以产生何种影响以及衡量这种影响的最佳方式。

盖茨认为，由于投资者（承担风险者）仅收到投资回报的很小部分，因此私营部门对创新的投资不足。国家往往会出面满足那些未得到满足的需求，不过盖茨认为，各国政府（至少那些民选政府）不会采取长远观点，不愿承担风险。

这正是慈善家可以弥补空缺的领域，也就是盖茨

所称的“催化式慈善”。政府擅长于发现少数的成功者，而慈善事业则擅长于支持大量的潜在成功者，从而增加个人为某个特定的社会问题找到最新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现在，慈善事业正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

目前，各个企业在为社会作出贡献（或者至少表面上如此）方面受到的压力日渐增大。反对者认为，企业界只做那些有利于其利润的必要事情。各大公司设立了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大肆吹嘘他们生产的产品在环境、教育、卫生和文化领域的好处。当制药公司以更低的成本在贫穷国家提供治疗艾滋病或肺结核等疾病的救生药品，或者将相关专利开放供通用生产企业使用时，它们这样做是为了改善患者和贫困人口的命运，还是迫于法律和政治压力？

以全球超级富翁为服务对象和介绍其情况的《福布斯》杂志在今年6月份举办了一次慈善峰会，邀请161位亿万富翁听取了巴菲特、史蒂文·凯斯、盖茨以及奥普拉·温弗瑞等主旨演讲人就如何改变世界发表的演讲。目前，世界经济论坛举办了一场有关社会公益创业的研讨会。按照格雷格·迪斯的定义，社会公益创业是指“寻求针对社会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

目前，美国纽约市正在开展一项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融资试验——融资不仅将用于衡量其实施成果，实际上也将取决于其实施成果。高盛集团已投资一项“社会效益债券”，为一家非营利机构提供资金，设计和实施一个旨在使纽约的重新犯罪减少一定目标数量的项目。如果项目实现了该目标，高盛即可收回其投资；如果项目超过了该目标，该投资公司就将盈利。得益于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的慈善基金会提供的补助金，先期的96亿美元投资的亏损限制在总金额的1/4以内，也再度证实了慈善风险承担者的重要性。

在本期的《金融与发展》，我们分析了慈善、私人投资和社会公益创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们正如何寻找解决社会各种最迫切问题的更好途径。■

马莉娜·普里莫拉茨（Marina Primorac）是《金融与发展》的责任编辑。